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6.01.001

审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多维视角

王铁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要:要素禀赋论又被称为要素比例理论,被誉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大柱石。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将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归因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本文的分析表明:新结构经济学忽视了某些重要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如果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来制定一国的发展战略,企业在要素使用结构上将会高度一致,从而可能导致一国经济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产生巨大波动。

关键词:结构;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要素禀赋

中图分类号:F01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6)01-0005-07

Findlay 将比较优势理论称为“最深邃且最优美的经济学理论”。^[1]与李嘉图不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 模型)不是用相对生产率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而是用要素禀赋差异来构建比较优势理论。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要素禀赋理论,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其核心观点是:一国要想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必须选择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违背自身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结构由于忽略了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注定要导致一国的结构转变难以实现,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2]本文首先回顾了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历程,其次在简要概括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其理论缺陷,然后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分别考察了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可能导致的经济后果,最后是结论。

一、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历程

要素禀赋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绝对优势思想,斯密认为,以劳动生产率绝对差异为条件,按照“绝对优势”进行的分工必然使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都获利。根据绝对优势思想,每个国家都应该专业化生产其具有绝对

劳动生产率优势的产品,进口那些不具备绝对优势的产品。在斯密之后,李嘉图认识到,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也可以专业化生产其具有相对生产率优势的产品。与斯密和李嘉图从生产率的角度来认识贸易条件不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将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上,H—O 模型认为,只要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并非完全一致,一国通过生产并出口那些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仍然可以获得自由贸易的收益。^[3]H—O 模型的核心逻辑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个特定时间的要素禀赋是给定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了在本国市场上的要素价格。在价格体系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条件下,一国应该出口由相对丰裕的要素密集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比较低,进口由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

以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工业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包括 H—O 模型在内的古典贸易理论都将贸易的产生归结于外生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各发达国

收稿日期:2015-11-18

作者简介:王铁成(1981-),男,河北迁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与发展战略研究。

家的产业内贸易量迅速增加。这些国家有着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但对于同一产业来说,一国既进行进口也存在出口,面对这一新现象,用以解释产业间贸易的H—O模型不再适用。新的经济现象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以Dixit和Stiglitz、Krugman为代表的新的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基于产业内贸易的现象。^[56]新贸易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H—O模型成立的条件,即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国际贸易也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决定各自的专业化方向,因此不仅各国之间存在的资源或技术差异可以导致有利于双方的贸易的产生,规模经济也可以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新贸易理论并非完全否定H—O模型,而是认为要素禀赋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可以进行传统产业间贸易,而要素禀赋趋同的国家可以进行产业内贸易。^[7]新贸易理论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关键假设,即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将内生的规模报酬因素视为推动分工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条件,因而被称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用更多的因素来理解比较优势的产生。比如Clarida和Findlay将内生比较优势、最优政府政策和国际贸易整合到一个框架中进行分析,将制度因素看作是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8]Yang和Borland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下用分工来解释经济增长,在这个框架下,比较优势是作为分工的结果内生出现的,^[9]Grossman和Maggi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理解比较优势的来源,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反映了劳动力禀赋中能力分布的差异,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相对同质化,那么这个国家应该出口生产流程具有技术互补性特点的产品;如果劳动力资源具有能力分布多样化的特点,那么这个国家应该出口那些个体能力在生产中更加重要的产品。^[10]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描述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外生的,这种先天的比较优势因素的演进速度非常缓慢,因此难以用来理解动态的经济增长过程。而后天比较优势则可以通过合理的经济决策创造出来,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推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因此,这种动态的、以后天因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势理论更适合解释经济增长。

以李嘉图、H—O模型为代表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和以斯密的分工理论为代表并得到持续扩展

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两条主线,两种理论脉络的差别在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发展的不同方向,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关注的主要是资源的分配和流动方向,而内生比较优势关注的则主要是经济组织的分工网络等拓扑性质。^[11]长期以来,外生比较优势学说,比如H—O模型一直占据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一些学者,比如林毅夫也将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H—O理论视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循的发展战略。^[12]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新近发展大部分都聚焦于分工以外的因素,比如人力资本、市场组织、制度因素等等,应该说,这些理论扩展已经远离了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其主题已经从传统贸易理论对贸易条件的关注转移到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广泛因素的研究中,这种将决定比较优势的要素不断扩展的研究趋势将使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变得十分松散,而这也导致了这些扩展理论大多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力。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及缺陷

要素禀赋理论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将一国给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特点作为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新结构经济学遵循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将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视为生产中的要素禀赋。一般来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要素禀赋情况存在着重大差异,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各国不同的经济结构。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含义

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一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导致其变迁的因素进行了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将经济结构的变迁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这与传统的增长理论用总量生产函数来建立理论模型不同,它强调结构和结构变迁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总结为:将经济增长过程看成是一个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合理的产业结构及其升级要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迁的基础上。其背后的逻辑是,在价格机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市场上的要素价格可以充分反映出一国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企业据此选择使用相对丰裕的要素进行生产。在比较优势战略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及对产业升级中的外部性进行补偿。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抽象的要素禀赋结构概念

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是新结构经济学分析的起点,是其分析框架中的核心概念,但对于一个具有显著地区差异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个概念过于抽象,难以把握中国各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情况。此外,由于忽视了历史因素对产业结构的重大影响,新结构经济学未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作为一个总体概念,要素禀赋指的是一国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等,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以上各种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如果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会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比如一国劳动力要素相比资本更加丰富,那么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就比较便宜,因此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这是实现工业化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只是着眼于总体情况,这种推论方式没有问题。但这种用一个代表性个体来概括总体情况的方法完全忽视了经济中的异质性问题 and 地区差异问题。

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一国经济可以由一个代表性企业来代表。但对于现实中的企业来说,要素禀赋结构是一个连续图谱,一端代表着对某种要素最低的要求水平,一端代表着密集使用该种生产要素的最高水平。这些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从应用比较原始的技术到前沿技术的应用。不同企业的要素使用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源于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可能受到企业所处地区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比如相比服装企业,钢铁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要高很多,许多出口企业聚集在沿海城市并不是因为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而是因为出口企业可以利用沿海地区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①这些行业从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行业、服装业到资本密集型的机械制造、石油天然气行业,到技术密集型的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中对各种要素使用比例的要求的差异非常大,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不按照一国特定的(平均意义上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生产,那么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比较高,除非能够

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各种形式的长期补贴,否则企业将不具备自生能力。但实际情况是,具有不同要素使用结构的这些产业都能生存下来,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哪个行业由于与中国总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符而消失,当然这并不排除行业内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现象。

中国是由三十多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组成的规模庞大的经济体,东部地区要比中西部地区先进很多,许多沿海地区已经失去了低工资行业上的比较优势,开始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此时还在扩大这些行业的规模。这些现象背后是各地区要素禀赋差异的表现,正是因为东、中、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技术结构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各地区才在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上有着重大区别。因此,要素禀赋这个总体概念不适用于中国这样有着显著地区差异的发展中大国。

地区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显著地体现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同时缩小地区差距,中国政府确立了将沿海城市作为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核心地区、将劳动力密集性和低附加值行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规划,比如商务部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确立了将中西部地区的 31 个城市作为沿海城市产业转移的区域,并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转移。^②产业转移使得沿海地区的企业可以更多地从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积极参与研发活动,摆脱对廉价劳动力要素的依赖,内陆城市则可以成为生产中心,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等其他成本优势。产业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物流成本的下降,产业分散化现象必将逐步涌现,而这一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因此,产业转移现象体现的是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多层次性,这种多层次性不能用劳动力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来概括,只能用地区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来解释。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只有考虑到地区差距、地区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才能使宏观经济政策满足不同地区的不同需求。因为从中等收入转型到高收入阶段与从低收入转型到中等收入阶段所需要的战略与政策是不同的,比如说,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转型过程中,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实现的,而一旦经济达到中

等收入水平,要想继续迈入高收入水平,就不能再依赖这种劳动力转移模式,而是要依靠规模经济、专业化和产业集群。^[13]然而由于中国存在的地区差异问题,这两种模式必须同时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用要素禀赋结构的观念来确定一个具有显著地区差异的国家的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不恰当的。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缺陷之二:忽视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特点

新结构经济学将主要理论观点建立在要素禀赋理论基础之上,将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归结为:“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多样化和收入增长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与有关产业结构变迁的论述类似,新结构经济学同样将技术进步归因于要素结构的变化:“因为任一时点上的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国家若想在技术发展阶段上不断爬升,首先应当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演进,从而推动其产业结构偏离由此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企业就需要升级产业和技术”。^[14]

上述观点表明,新结构经济学将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视为技术进步的前提。依据此观点,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总体要素结构发生变化时,技术进步才变得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就应该保持既定的技术水平。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路径依赖”的特点,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保持一致的离散的过程。

针对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如何演进等问题,美国技术思想家W·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它是什么以及如何演化》一书中阐述了有关技术以及技术演化的若干重要特征:(1)技术的组合特征。技术结构的首要特点是组合。任何技术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系统,任何技术都是从已有技术中产生的,而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已有技术的某种组合使得新技术成为可能。阿瑟同时指出,说技术创造了自身并不意味着技术是有意识的,技术集合通过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人类活动实现自身构建,就像珊瑚礁通过微小生物自己构建自己一样。技术的组合特性体现在技术的集成结构上。技术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组合,其最基本的结构包括一个执行基础功能的主集成(A Main Assembly)以及一个支

持基础功能的次集成(Subassemblies)集合。不同的技术表现不同,服务于人类不同的目的,但是其结构却是相同的,即各种技术都是由集成块组合而成的,这些集成块聚集在一起通过一个基本原理发挥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2)技术的递归特点。递归性(Recursive)是技术内部结构的另一个特点。递归是指结构包含的组件与结构本身相似。一项技术是由主集成和次级集成的集合构成的,可以将技术整体看作是树干,主集成是枝干,次集成是枝条,最为基础的部分是远端的小树枝。因此,技术具有层级结构,在组成技术的各层次中,每个集成块都是一种技术,一个集成块包含的次一级的集成块同样也是技术,这种模式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最基本的零件为止。对于一项具体技术来说,比如柴油发动机,递归性并不是说一台发动机包含着许多小的发动机,而是说柴油发动机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技术,而各组成部分包含的次一级构件也是技术,它们是按照相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就是技术递归性的含义;(3)现象是所有技术的基础。阿瑟说,“现象是技术赖以产生的必不可少的资源。所有的技术,无论是多么简单或者多么复杂的技术,实际上都是应用了某种——通常是几种——现象之后,乔装打扮过的样子。”^[15]

从布莱恩·阿瑟对技术本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化过程具有一个重要特点:路径依赖。“依赖”的意思是受到过去因素的影响,但不是决定于过去的因素。任何新技术的出现都依赖于某些原有技术,不掌握这些技术,新技术就难以出现,但是任何处于前沿的技术也将被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成为未来技术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对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来说,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密集型行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必要的生产要素,还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需要在生产流程中不断改进制造工艺,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可能面临着巨大的经营风险,这是因为最初的技术必定是不成熟的,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往往不具有市场竞争力,但是这个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难以想象一个一直生产服装的企业可以迅速转变为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芯片生产企业,同样,一个产业、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过程往往始于产品没有竞争力的阶段,始于整体要素禀赋结构尚未实现转变的时候。一国总体要素结构的稳定并不否定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

定企业具备更高级别的生产要素,从而生产出与总体要素禀赋结构不相符的产品。此外,具备“路径依赖”特点的技术进化过程内在地要求企业必须尽早地介入到某种产品的生产中,而不是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之后再生产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如果承认技术的“路径依赖”特点,那么就认识到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都经历过不具备竞争力的阶段,对于一个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来说,在其发展的某些阶段中也存在产业和产品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四)新结构经济学的缺陷之三:忽视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偶然因素

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变迁,但许多对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比如战争、经济危机等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偶然因素并不常见,同时产业结构在战争、危机期间的变化往往是这些偶然因素所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中附带的正面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期待以这种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变迁。但是这些偶然因素在推动产业结构变迁中所起的作用却提醒人们,当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并非完全源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自然演化,偶然因素对于塑造一国产业结构也能产生重要影响。

在战争年代,企业的生产活动必须满足战争的需要,不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这将导致一国的经济结构发生非自然的变化。例如,二战深刻改变了德国的经济结构,战前德国的经济发展重心是以原材料投入为主的钢铁、煤矿等产业,战时需求使得企业生产逐渐转向汽车业、发动机、航天技术、电子以及雷达等成品制造业。虽然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且国民经济体系遭到了致命破坏,但是德国经济很快就恢复到战前水平,创造了战后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要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深入了解战争对德国经济结构的影响。^[16]再比如,一战将日本从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一战开始时,日本的农业产值大于工业产值,1914年,农业产值为14亿日元,工业产值为13.7亿日元,到了1919年,其农业产值增加到41.6亿日元,工业产值增加到67.4亿日元,首次超过农业产值,成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家。^[17]二战进一步改变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工业总产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但是工业结构发生了巨大

变化,原来以纺织品和食品为主的生产结构转变为采矿业、有色金属业和机械工业,战争给日本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可以与日本最初的工业化带来的影响相提并论。^[18]

战争不仅可能导致一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还会导致一国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发生迅速的、不连续的变化。战争使得劳动力要素在短时间里变得十分稀缺,大量劳动力脱离生产活动加入战斗序列,这使得企业必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应对劳动力要素的大量流失,比如研发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和设备。以法国为例,一战期间,在政府的扶持下,法国的重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在采矿、纺织等行业,企业采用全新的机器设备代替紧缺的劳动力。^[19]

除战争之外,还存在其他偶然因素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影响,比如经济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除了影响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之外,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开始思考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金融业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金融业的过快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活动与滞后的监管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实体经济也深受影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开始质疑、反省原有经济结构的合理性,纷纷着手制定调整措施,包括重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经济重心向实体经济转移、降低经济主体的杠杆水平、平衡进出口等等。

三、微观自生能力≠宏观经济稳定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要素市场完全的条件下,也就是说要素价格可以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企业大量使用本国丰裕的要素进行生产,那么不论是单个企业还是经济整体都将最有竞争力。随着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的成长,它们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创造出最多的经济剩余。当面临外部冲击时,这种按照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生产的经济体具备较强的抗冲击能力,因此可以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

上述论证过程从微观个体——企业出发,认为微观主体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决定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但由于如下三个因素,不仅不能从微观主体的生存情况推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况,同时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建议还意味着更大程度的经济波动,

这三个因素分别是:难以预测的“涌现秩序”;外部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面对冲击,“大一统”的生产要素结构缺乏弹性。

(一)难以预测的“涌现秩序”

哈耶克指出,应该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现象来说,相比均衡结果,对自发秩序形成过程的关注更为重要。^[20]哈耶克认为,人们很难从个体行为展现出的“简单现象”推导出大量行为主体在相互作用之后展现出的“复杂现象”,即使“简单现象”遵循的是非常简单的规则,数量非常大的主体经过相互影响之后将展现出何种宏观秩序仍然难以被人们预测。

之所以难以从“简单现象”推导“复杂现象”,是因为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根据“涌现秩序”的观点,经济中的某些秩序是自发形成的,在许多特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这些秩序,在这些因素中就包括不可预期但同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对于个体来说,这些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很低,个体往往会忽略这种事件,但是对于大量个体的大量活动来说,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几乎是一定的。

(二)外部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同样受其他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影响。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由于中国拥有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和城市化水平,劳动力的供给接近无弹性,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使企业保持市场竞争优势,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生产活动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但这一过程能否实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模仿与追赶行为的时机和力度。从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并没有实现高速的、可持续的增长,这其中包含各种因素,比如种族问题、内战、军事独裁、错误的发展战略等。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与中国类似的禀赋结构或技术条件,一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走上正轨,那么这些国家就会迅速建立起与中国类似的产业结构,发挥其与中国类似要素禀赋优势,而这将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甚至被淘汰。

因此,面对外部要素条件的变化,一国的产业结构往往要做出被动调整。而这种外部条件的变化

时机和变化力度都难以预测,进而导致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受到外生因素的作用,同时还是高度不确定的。

(三)宏观经济波动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企业生产活动在要素使用结构上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很可能导致经济体面临冲击时出现严重波动。相反,如果企业更多地展现出异质性,积极进行创造性破坏活动,那么经济面临冲击时将会展现出很强的弹性。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在要素使用结构上保持高度一致,那么外部冲击,尤其是国内外要素市场的重大变化可能导致经济剧烈波动。这种剧烈波动源于企业“自生能力”的获得与消失的时间点的高度一致。^③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在开放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取决于本国的要素成本优势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这一方面取决于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其他国家要素禀赋的变化情况,因此,企业的存活时间是外生决定的,如果国内外要素条件稳定,那么企业就可以一直利用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如果要素市场在短时间内出现重大变化,那么企业的成本优势就可能迅速消失,企业的生存能力也会在短时间内受到严重考验,如果要素禀赋的变化情况介于两者之间,那么企业就能得到重要的缓冲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但这些情况对于企业来说都是具有重大不确定性的外生变化。如果经济在短期中经历(国内或者国外)要素市场的重大变化,由于整体经济体遵循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众多企业在要素使用结构和生产技术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此时将同时遭受冲击,因此宏观经济将在短期中经历巨大波动。

与上述情况相反,如果企业不是依赖要素成本优势,而是依靠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来获得竞争力,那么经济体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就可以展现出更大的弹性。比如,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短期中迅速崛起,那么中国企业就要更多地进行创新活动,发挥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但这意味着企业的生存时间也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由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决定的,但此时企业的生存时间和市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些积极投资于R&D活动并将创新视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企业可以获得更有利的市场地位,企业的存活

时间也更长,虽然其他企业潜在的创新活动仍然可能导致本企业遭到淘汰,但相比依赖于要素成本的情况,企业可以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虽然个体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市场进出活动看起来是随机的,但是宏观经济面临冲击时却可能呈现出更小的波动,因为从整体上来看,创造性破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企业不会在整体上经历由国内外要素市场变化导致的巨大波动,经济波动是由不同企业的多种异质性活动造成的,这些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影响还有可能相互抵消,因此宏观经济波动会比较温和,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更强。

四、结论

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无疑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绝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本文的分析表明:首先,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中的核心概念——要素禀赋结构并不适用;其次,历史上的偶然因素对于一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也启发我们不能完全抛弃产业政策;最后,企业普遍具有自生能力并不等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依靠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国经济可以获得更好的弹性。

注 释:

-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 ②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 ③ 林毅夫认为:“自生能力是根据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来定义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则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反之,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则不会有人投资于这个企业,这样的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只有靠政府的扶持才能够生存。”参见林毅夫等(2003):《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参考文献:

- [1] Findlay R. Comparative Advantage[M].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1987. 514-517.
- [2]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9-20.
- [3] Heckscher, Eli. 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Swedish)[M].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1950.272-300.
- [4] Ohlin B. International and Interregional Trade [M]. Cambridge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1933.3-10.
 - [5] Dixit A.K,Stiglitz J.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3):297-308.
 - [6] 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9,(4): 469-479.
 - [7] Krugman P R. Intra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5): 959-973.
 - [8] Clarida R H, Findlay R. Endogen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Government,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1.
 - [9] Yang Xiaokai,Jeff Borland.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3):460-482.
 - [10] Grossman G, Maggi G. Trade and Divers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 (5): 1255-1275.
 - [11] 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J].经济学(季刊),2001, (1):19-20.
 - [12]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季刊),2010, (1):1-32.
 - [13] [美]霍米·卡拉斯.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A].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C].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471.
 - [14] 黄少安.新结构经济学侧评[J].经济学(季刊),2013, (3): 1085-1086.
 - [15] [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它是什么以及如何演化[M].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45.
 - [16] [美] 托马斯·K·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M].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86.
 - [17]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64.
 - [18] [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金毅,许鸿艳,唐吉洪,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57.
 - [19] 张经纬,张艳茹.战争、经济、科技发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190.
 - [20] F.A. Hayek.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M].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1964.332-349.

(责任编辑:许桃芳)

(下转第 63 页)